有些审批是守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改变过去重审批、轻管理的“公章式”管理惯性,为企业让出更多的市场发展空间,让市场的游戏规则自然整合企业资源,变在起跑线上管理,为在跑步中优胜劣汰。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审批设置过多、程序繁琐,已然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挫伤企业积极性的制度禁锢。国务院日前作出的减免314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在目前经济下行、急需释放经济活力的关键时期,可谓来得恰逢其时。

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而且减免的行政审批,重点针对投资领域、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特别涉及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发展、民间投资等方面的审批项目。

国务院这一决定的作出,不由令人想起那个多年来让中国企业家们既羡慕又无奈的对比:在欧美国家成立企业只需要去有数的几个部门申请、登记,十几个工作日就能合法开张营业;而在中国,据媒体报道,2008年,武汉市建设一个加气站,审批周期长达1年,需要一百多个部门盖章,其中最长的一个审批,耗时90天。

不论是琐碎繁难的审批,还是简单快捷的管理,评价其孰优孰劣,最为关键的标准是,行政审批的目的何在。在中国的管理部门看来,行政审批一贯扮演着“门卫”的角色,依靠繁复的“门槛”,将实力不足或者动机不纯的企业,挡在市场的大门之外,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起点。

应该说,这种对行政审批的观念,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繁琐的行政程序,不仅与灵活、快速的市场特性相悖,不利于企业迅速迎合市场发展;而且过于依赖制度的事前把关,尤其是当审批的背后拖上收费的“尾巴”时,就会产生有利的事情争着管,无利的事情互相推诿,不仅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很容易滋生腐败。

而国务院此次减免多项审批,不仅是对审批带来的交易成本日益繁重的纠正,更是一种社会管理观念的变化:那就是改变过去重审批、轻管理的“公章式”管理惯性,为企业让出更多的市场发展空间,让市场的游戏规则自然整合企业资源,变在起跑线上管理,为在跑步中优胜劣汰。

虽然说国务院此次减免300余项行政审批的决定,对处于经济下行期、面临经营发展压力的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来说帮助很大,但能否让这一“制度红包”真正惠及企业,相关部门还应表现出能够放下手中既得审批利益的勇气和决心,真正变与企业争利为替企业“松绑”。比如今年6月,黑龙江省颁布气候资源条例,规定企业探测开发风能及太阳能资源必须经过气象部门批准,连源于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空气与阳光,都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才能开发利用,与其说这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不如说是在保护部门的既得利益。

当然,这种督促有关部门“放权”的后续监管,依然需要中央制定更加人性化、可操作的“控权”制度;然而,不论是“放权”还是“加权”,这种行政审批权的增减变化,正是中国不断释放经济活力的见证。

公民论坛 事件观

谁能帮县长守住不贪承诺

□马涤明

“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今天,可以坦然地说,我兑现了在人大会上的承诺。”湖南祁东县县长雷高飞因为述职报告中的“四不”承诺,成为近日备受瞩目的新闻人物。但他也坦言,“在祁东的这段时间我敢承诺,但是我以后是否会成为贪官,不走到那一步,我也无法下结论。”(8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不是说承诺靠不住,承诺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但如何坚守承诺、能否坚守住,问题绝不简单。

坚守清廉,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能够完成的任务,而必须将个人置于监督之下,达到想不清廉都不能的境界。廉政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其防腐机制与经验中都有“三不”之说: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想了,不一定敢;敢了,不一定能,那么即便你不想廉洁,也不一定很可怕。

雷县长固守清廉的经验,一是我不敢,现在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和素养都比较高,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你。二是我不愿意,说实话他的家境也不错。而笔者认为,主要是“我不愿意”起了决定性作用。老百姓的监督意识确实大有进步,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在公众监督腐败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依靠网络曝光和舆论围观反腐败,不论偶然性还是成功率,都还不足以威慑到“不敢贪”的境界。而雷县长的“我不愿意”,其实就是以自律保证的廉洁。但我们很担心,如果雷县长不是“家境不错”,“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不是就难说了?

制度反腐防腐,是保证权力廉洁的唯一有效的出路,只有制度科学合理,足以使权力受到制衡约束,才能帮助雷高飞和“雷高飞们”守住承诺,守住清廉。这既早就是普遍的共识,又是常识,唯不该成为不可期之遥。

应给义务幼教一个时间表

□郑文

秋季开学在即,幼儿园“入园难”问题再次引发关注。近日,广州、北京等地频频“出招”,“摘帽”机关幼儿园、叫停赞助费、扶持民办幼儿园……这一系列举措能否破解“入园难”?(据8月23日《珠海特区报》报道)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政策和体制中,学前幼儿教育是非义务教育。由于没有真正将幼儿教育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而过于依赖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这直接影响着政府对幼儿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不可否认,目前私立幼儿园是幼儿教育的主体,但高昂的学费将幼儿教育带入趋利性的怪圈,这也使得幼儿教育的独特性、基础性和普及性等特征难以得到发挥,无疑影响到幼儿教育对人终身发展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性地位和作用,使素质教育失去了最基础的支撑。

随着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幼儿教育被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从一个人的成长教育来看,幼儿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不应徘徊在义务教育的外面。因此,应给免费学前幼儿教育一个时间表,一方面进行修改《义务教育法》的努力,将免费幼儿教育作为完整义务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列入法制轨道,从而为下一代享受到更为全面、更为科学的教育提供可能与保障,也为素质教育的推行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使之率先试点探路,积累经验为进一步全面推广进行有效的尝试。

义务幼儿教育能消除教育上新的不公平,且能提升民众对国民教育的满意度和教育和谐度。将义务幼儿教育提到极为迫切的议事日程,这无疑能体现政府责任之所在和民生期望之所在,使得“教育强国”的梦想不再遥远且越来越清晰。

应给义务幼教一个时间表,让“4%办公室”(实现教育投入要占GDP总量4%)积极有效作为,“入园难”将不再让民众如此纠结。

“设伏抓嫖”谋杀政府公信

□杨涛

带着按摩女在路边走着,就被认定为嫖娼?西安一位市民称自己遭遇警察“抓嫖”,被罚了三千块钱,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热线》节目播出有警察涉嫌“设伏抓嫖”后,引起了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他们连夜对于辖区内的所有浴足店进行了排查。并着手对“设伏抓嫖”一事展开调查。

警方使用的“设伏抓嫖”这种侦查形式叫“警察圈套”、“诱惑侦查”。“诱惑侦查”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暴露型”,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本身有犯罪意图,警察所做的只是让其意图暴露出来,比如某一毒品贩子手中有毒品急于要找买家,警察得知后以买方身份与其取得联系;另一种是“诱使型”,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本身并没有犯罪意图,警察制造条件、采取行动诱发其产生犯罪意图,比如警察并不知谁在贩卖毒品,便四处放风说要以高价买毒品,有人因此铤而走险去买来毒品转而卖给警察。韩森寨派出所搞的“设伏抓嫖”属于“诱使型”的“诱惑侦查”,实际是诱骗他人犯罪,是一种制造犯罪行为的举动,应当禁止。因为,韩森寨派出所是指使失足妇女引诱他人嫖娼,引诱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公民产生嫖娼的违法意图,实际上是在陷人入罪。

即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圈套”也作出了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然而,地球人都知道,尽管警察明确知道这种诱人违法的“设伏抓嫖”是违法的,但警察执意而行,就是因为有罚款的诱惑在此,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对公民罚款,进而有返还。所以,必须认识到这是一起谋杀政府公信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上级部门必须从维护和恢复政府公信的高度,严肃处理这起事件,让诱人犯罪的“警察圈套”不会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画评

曹一/画

“大圣”也无奈

2010年,山西娄烦县提出打造“孙大圣故里风景区”,规划修复原有的水帘洞、悟空出世石、猴王庙等古建筑。两年过去,除了绿化的5000多亩荒山以及四层楼高的接待中心外,其他规划都未实施,虽已投入6000多万元,但已成烂尾工程。

(8月23日《新京报》)

>>媒体视点

不讲理是开放社会的大敌

当一个社会讲理者受到压制,让人感觉无处讲理的时候,社会是危险的。不讲理,讲拳头和暴力,矛盾会激化;不讲理,讲诡辩和谩骂,智商会退化和被拉低;不讲理,讲人情和潜规则,腐败会进一步恶化;不讲理,讲圈子和派别,阶层会进一步分裂;不讲理,讲邪理歪理,法律被无情地踩在脚下,理性被无情地驱逐,良善被无情地碾压,对话和沟通机制自下而上地被打碎的时候,野蛮丛林中的暴力中,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曹林)

烟草业需对社会保持谦卑

即便我们承认,在当前阶段,烟草有其存在的理由,这也不能成为大张旗鼓宣扬所谓“烟草文化”甚至是变相进行营销的口实。即便有高额利润,烟草业也不能因之沾沾自喜。作为一个对公众健康、对社会发展都有着巨大负面作用的产业,必须保持谦卑的姿态,遏制自身发展的欲望,减少烟草的社会需求量,这才是烟草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所在。(摘自《京华时报》,作者:金苍)

“善待质疑”也是一种执政能力

质疑是揭露假恶丑、达致真善美的手段,是创新创造的源泉,是促进社会理性和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鸦雀无声的盲目迷信,比七嘴八舌的争鸣更可怕。因为质疑,事实和观点在“赛马场”上针锋相对,真相和真理终会无限接近公众。盲目迷信,错误和丑陋可能假借权威的幌子行其所私。对执政者而言,群众学会了质疑,习惯了质疑,适应了“质疑式思维”,是民众理性、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值得欣慰的好事,也是执政环境的可喜变化。看到质疑,就暴跳如雷,恼羞成怒,甚至指责别人患了“习惯性质疑症”,这不是执政者的理性态度。一个明智的执政者,应该以质疑为起点,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做好自己的事。(摘自《新华日报》作者:刘庆传)

禹晋永如何炼成“财富英雄”的

禹晋永“创造”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成功神话,但这个神话也折射出社会的多重扭曲。那些曾经站在禹晋永身边的人,那些曾经为禹晋永贴金的机构,那些闭目塞听为禹晋永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的评选活动,以及纵容禹晋永盗用教授、研究员、导师名号的大学,都应该做出深刻的反思。当禹晋永的真实面目终于得以还原的时候,他所搅浑的那潭池水,是否也能够随之回归清澈?(摘自《北京青年报》,作者:蔡方华)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